

褚潇白◎著

空间叙事 与终末意识

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褚潇白◎著

空间叙事 与终末意识



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叙事与终末意识：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研究 / 褚潇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161-8805-7

I. ①空… II. ①褚… III. ①基督教—宗教文学—
文学研究—欧洲 IV. ①I50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16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凌金良 陈 彪
特约编辑 胡国秀
责任校对 蒋海军等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上海浦江人才计划 (Shanghai Pujiang Program)和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基金资助，谨致谢忱!

一 引言	(1)
二 “救恩之塔”：《赫马牧人书》中“塔”的空间形式 和救赎意识	(9)
1. “塔”与空间性语言	(14)
2. “塔”与空间连续性	(19)
3. “塔”与救赎的实践	(26)
三 “外衣”与“荫蔽之所”：典外文献《以赛亚升天记》 和《以斯拉五书》《以斯拉六书》的终末意识	(41)
1. “外衣”与末世意识的展开	(50)
2. “外衣”与末世象征语言	(54)
3. “外衣”与存在的谱系	(58)
4. “荫蔽之所”与末世之死亡	(63)
5. “荫蔽之所”与末世之永生	(67)
6. “荫蔽之所”与历史的实体	(71)
四 “双城记”：护教文学中“城”的形象 及其意愿基础	(83)
1. 护教文学与“城”的形象	(91)
2. 世俗之城与诸神的谱系	(99)
3. 罪的“公共性”	(105)

4. 上帝之城与基督的形象	(112)
5. 双“城”的不同意愿基础	(118)
五 “升阶之歌”：《忏悔录》救赎空间的动感形式	(133)
1. “上帝是谁”和“我是谁”	(136)
2. “涕泣之谷”与“升阶之歌”	(145)
3. “为我们的上帝”及其空间特征	(155)
4. 修辞之恶	(163)
5. 欧斯提亚异象	(172)
6. 记忆与自我	(179)
7. 升阶之歌与 frui	(186)
六 “归家之途”：《哲学的慰藉》中“语言” 的存在空间	(213)
1. 失语	(220)
2. 对话	(230)
3. 沉默的回旋	(241)
4. 复调	(252)
七 结语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81)
主要译名对照表	(297)
牛津札记（代后记）	(309)

引言

早期教会的启示文学、护教书、书信以及《圣经》外典，往往不被纳入后世的文学史线索，连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忏悔录》（*Confessions*）、波爱修（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等名著也较少被视为纯粹的文学写作。究其根本，应是由于对西方文学史的叙述基本上是以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念为依据，加之国内外对早期基督教文学的研究多为文献的整理和介绍，或者从中世纪神学的角度加以阐释。然而，古典时代晚期（公元1世纪至6世纪）的这些早期基督教作品实则对西方后世文学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体现了古希腊、罗马精英文化之外的另一种平民价值，并借助《圣经》叙事的历史观和终末意识，使希腊戏剧中单纯的“城邦空间”发展为动感的双重空间，并以内在冲突挤压外在叙事，进而使心理独白成为空间转换的要素。虽然其叙事技巧还远未达到近现代西方文学的成熟程度，但凭借其平民语言及修辞形式的运用，成为古代希腊、罗马精英社会价值之外的独立价值根源。它出色地运用平民眼中的历史，使

历史找到它属于平民的自我注视方式：护教作品依据《旧约》的编年讲述各民族的历史，忏悔录类作品透过个人故事表达世界历史的上帝经验……无论哪种文学类型，它们都依据《圣经》叙事的价值缀成故事的记忆方式，文学叙事的平民性使“历史是价值重估”的历史意识成为可能。

《圣经》最初是以口头语言的方式进行传承的，这使它有别于用科学语言或哲学语言写就的作品。后者是为了知识的传递，是透过理性论证积累确定性的方式；而口头文学叙事则是平民记忆的历史，是透过生活的复述累积信念，并达成关于真理的记忆。这种文学叙事守护着平民的集体意识，使平民的集体经验成为历史讲述的对象。《圣经》及早期基督教文学叙事不仅守护了叙事的平民形式和意识，而且通过它们的努力，使文学叙事成为以平民生活为中心的叙事，成为中古时期以平民价值重估希腊、罗马精英文化的重要方式。

虽然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作品的叙事语言主要受《圣经》影响，但其叙事方式所采用的戏剧布景则有浓厚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色彩。古希腊、罗马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是戏剧，最高成就也体现于戏剧创作，而戏剧的流行与希腊平民社会的形态密切相关。平民社会讲究公共空间的共享与张扬，戏剧以宏大的场景和复杂的情节，充分显示平民社会的冲突和平民对贵族统治的反抗。古希腊、罗马戏剧可以充分展示公民空间的巨大容量，极其适合表达平民社会公共内容的复杂性和争辩力。它透过语言的德

性表达作者和各方的观点，使个体对自身及其自由的辩护成为可能。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正是发轫于对它自身的辩护，亦即：要从公共空间中建立自己的身份。不过，与古希腊、罗马戏剧不同的是，基督教文学的自我辩护还引入更宏大的背景，这就是基督徒以上帝子民身份所处的宇宙剧场。古希腊、罗马戏剧局限于城邦或帝国的视野，主要表现城邦或帝国的政治活动以及个人的命运遭际，由此唤起人们对城邦或帝国的记忆，显示生命及其自由的尊严。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文学则越出这种限制，讲述宇宙背景下人类和个体背叛上帝的历史、人类自我背叛的历史以及上帝对于人类的救赎历史。由此，基督教文学使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单重空间（城邦空间）发展为双重空间，早期基督教的宇宙戏剧叙事与古希腊、罗马世俗生活空间的二重叙事成为基督教文学戏剧叙事模式的根本特征。基督教启示文学的双重空间意识，最为突出地显示了戏剧叙事中空间秩序的变奏。启示文学善于借助空间的变奏传递叙事的记忆蕴含，显示空间属性所引发的记忆指向以及身份意识的转化。其他基督教文学作品也使用类似的叙事模式，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后四卷以解释《创世记》为主旨，亦充分运用了启示文学中的戏剧模式，即：透过《创世记》经文所暗示的空间表象的交集去表现救赎与罪如何传递成为空间的形态。奥古斯丁甚至对戏剧空间作了更复杂的使用：他没有如基督教启示文学那样对空间与记忆进行对应性和层级性分离，而是用罪性空间和神圣空间的混合去诠释罪业的神圣

性以及对个体活动和人类历史的自欺。这也是其《上帝之城》(*City of God*)文学叙事的历史视野。

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对古希腊、罗马戏剧叙事空间的拓展，是基督教作家把不同的文学记忆融入古希腊、罗马生活方式的结果，是用《圣经》叙事的历史观重塑古希腊、罗马戏剧单纯的空间叙事的结果。《圣经》本身的文学叙事传统属于典型的历史叙事，交织着犹太人的历史（世俗历史）与上帝的历史（神圣历史）两个方面。无论《创世记》《出埃及记》《约书亚记》《撒母耳记》和《历代志》，还是众多先知书，其关于上帝与人的宇宙戏剧场景之中都蕴含着这两种历史的张力。一方面，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在运用古希腊、罗马的戏剧形式，另一方面，它也在改变古希腊、罗马的戏剧叙事：它通过把希腊人与基督徒、希腊罗马历史与犹太人的历史关系置入宇宙剧场，依照上帝的历史演变出空间终末论的叙事结构。比如，塔提安(Tatian)的《致希腊人书》(*Address to the Greeks*)和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的《劝勉希腊人》(*Exhortation*)就蕴含了这种叙事尝试，把古希腊、罗马历史中的君王、贤者和英雄，一个个重新领入新的历史空间：他们不再仅存于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的空间中，而是被领入上帝巨眼下的宇宙空间中。这改变了古希腊、罗马戏剧叙事的节奏，用终末的视野表达了存在空间的重置。又如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前八卷是古希腊、罗马戏剧叙事被重新塑造的伟大作品，它把《圣经》的历史叙事充

分融汇于罗马共和国的恢宏剧场之中，呈现出上帝君临于罗马共和国这巨大剧场的威严光芒。这种将历史融汇于空间的犹太基督教视野还表达在关于某个具体人物的文学叙事之中，《坡旅甲行传》（*Polycarpus*）就是最好的例子。

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戏剧更深刻的相异之处还在于：后二者的叙事特性是在同度空间中展开的结构，戏剧作品以“恶”对空间的侵入作为叙事的力量，用“恶”的象征造成空间转换的根据；而前者虽然采用古希腊、罗马戏剧叙事的空间冲突方式，却拒绝使“恶”成为叙事的支配力和解释者。它的叙事具有清晰的真理准则，是要不断地显明“恶”的代言者、诠释者和自欺者。如果说，古希腊、罗马戏剧叙事使“恶”不断地占据空间，那么，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则使叙事空间不断压缩外在冲突，而其内在冲突却超过了古希腊、罗马的戏剧叙事，由此发展出更具心理独白的意识进程，以此替代了古希腊、罗马歌队叙事的角色。

总之，戏剧叙事使语言展开为空间的记忆层次，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使用二重空间依次叠加出种种记忆的交集。启示文学和《赫马牧人书》都利用了戏剧叙事的这类特性，以表现文学人物隐藏的记忆形式，显示更高的存在空间对叙事者记忆空间的催逼（现代诗人中荷尔德林和里尔克的诗也有这样的意象）。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对《圣经》人物、故事和信念重新想象，以心理语言及其独白形式的发展取代希腊、罗马戏剧的歌队

角色，形成以内在冲突为空间变奏并显示记忆层次之展开的叙事结构。由此，这些作品把人（包括各民族和个人）的命运置于上帝创造和救赎的宇宙戏剧之中，显示这幕戏剧作品普遍的冲突，展示叛变和规训、反抗和救赎、欲爱和圣爱、知识和意愿与整个人类历史的文学关联。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也使用《圣经》文学的多种形式，主要包括历史（如《历代志》）、传记和传奇（如《士师记》）以及启示文学（如某些先知书和启示录）的叙事模式，拓展了古希腊、罗马戏剧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内涵。在古希腊、罗马戏剧之后，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发展出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为复杂、表达手法更为多样的文学形态。尤其是把心理叙事及其独白形式与历史辩护和启示文学的终末意识融为一体的叙事元素，对于整个西方文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把古希腊、罗马戏剧中遭际的偶然性、命运的未知性以及抗争的徒劳和荒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述说，改变了记忆传递的空间手法，最终也改变了西方文学对人的身份的记忆源头，使得命运和悲剧这样的人性经验不仅在未知状态里依然保持着高贵和尊严，而且在省思状态里仍保有活力和动力。这是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文学叙事的精彩之处，也为后世西方文学所呈现的独特人论作了基本铺垫。

“救恩之塔”：

《赫马牧人书》中“塔”的
空间形式和救赎意识

在古典基督教世界，有一部备受初代基督徒推崇，甚至差点被列入正典的作品——《赫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最早提及此书的是西方教会的爱任纽（Irenaeus）和东方教会的亚历山大利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后者曾多次满怀敬意地引用此书中的话语，而另一些古代作者也熟悉此作。¹这些伟大教父们的证词有力地表明，至少直到4世纪为止，《赫马牧人书》都是基督教正统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赫马牧人书》本身没有提供该书作者及成书年代的任何直接信息，因此历来颇多争论。如今，研究者已普遍接受该书的成书年代为公元2世纪上半叶前十年间或1世纪晚期。²此书最早用希腊文写成，早期曾两次被翻译成拉丁文，后还被译为科普特文（copt）。人们一度认为，最早的希腊文稿已经散佚，直到1855年，在阿陀斯山（Mt Athos）上发现了15世纪的手抄本，除了最后一些章节（第三卷寓言第九部分的若干篇目），该抄本几乎包括此书所有部分。除此以外，目前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希腊文残本，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分别是：圣经西奈古抄本（Biblical Codex